

【个人记忆】

□吕家乡

《归来》(张艺谋导演,陈道明、巩俐主演)是一部耐人寻味的好电影,不过其中有个重要的细节搞错了:台词说陆焉识“平反”了,画面上展示的却是“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书。其实,平反和摘帽是大大不同的,平反表示冤案得到昭雪,从此走出了“另册”;摘帽则表示罪有应得,虽然“改好了”,摘帽后仍然属于“另册分子”。再者,错划的右派并没有“平反”之说,而是“改正”。在一部以错划的右派分子为主角的电影作品中竟出现这样似是而非的硬伤,可见历史真相之不受尊重在今天是何等习以为常!

从1961年11月到1979年1月,我度过了17年多“摘帽右派”的岁月。现在欲罢不能地旧话重提,不是为了诉说酸楚,一则是为了存点资料备考,二则是因为一想到那些年就心怀愧疚,挥之不去,公开示悔才能于心稍安。

按照党中央的决议,这一段岁月基本上是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之下。我既是这个路线的受害者,更是这个路线的竭诚拥护者。

摘掉帽子、走出教养所之后,我确定的基本态度是老老实实地改造、埋头苦干,戴罪立功,以实际行动说明自己对党的忠诚。1963年我娶妻生子后,有了为人夫、为人父的家长责任感,这种态度更加牢固,时时告诫自己:切不可像当年那样头脑发热、感情冲动了。我反省了1957年跌跤的原因,主要是对基层领导不够尊重,觉得自己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比他们领会得还好。我接受了教训,从此把拥护党和拥护基层领导统一起来,对校领导和教研组的党员组长都由衷地尊重。

1962年暑假后,我调到山东师院(后来叫山东师大)附中。校领导很有原则性和事业心,在对我的掌控上确定了“政治上心中有数,业务上放手使用”的方针(这是在“文革”中从大字报上看到的)。我一直担任高中两个班的语文老师,对教学工作确做到了全心全意、呕心沥血。我给每一个学生建立了学习档案,他们的课堂表现、周记、作文等情况都有具体记录。过一段时

《归来》观后自沉吟(上)

在一部以错划的右派分子为主角的电影作品中竟出现这样似是而非的硬伤,可见历史真相之不受尊重在今天是何等习以为常!



间,就根据教学档案记录的情况,和学生个别交谈一下,帮助他发扬长处、克服缺点。在作文教学上,为了体验学生作文的滋味,我曾多次“下水”示范(教师像学生一样写作)。学生的每次作文我不但认真写评语,在全班做讲评,还选择部分学生个别交谈。根据语文的工具性特点,我力求让语文学习渗透到学生的一切学习和生活中去。我把学生的一切阅读机会都当做阅读练习,把学生的一切动笔机会都当做写作练习,给以关注和辅导,因此不仅常常和政治课、历史课等文科的老师配合,还常常和数理化老师配合,研究数理化学习中的语文问题。至于黑板报、广播站、运动会、下乡劳动总结等等,更是我用来指导学生锻炼和发挥写作能力的机会和场合。在“突出政治”的那几年,在团委和班主任的指导下,学生中间也开展了“深挖阶级烙印”活动,每个学生都不止一次地抒写这方面的心得体会。我则从语文角度积极配合这个活动,学生动笔前指导他们如何写,写后则和班主任一块审阅;班主任从政治思想

上给以点评,我从语文角度给以点评。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课内和课外的界限,打破了语文课和其他功课的界限。这样,一方面消除了一些学生害怕写作、厌烦写作的心理障碍,另一方面也切实暴露了一些学生在写作态度上的缺陷。有的学生虽然语言流畅,却不能据实地表达。有一次让学生写一篇关于本班教室的“说明书”,班里的“小文豪”竟脱离实际地信口开河。1964年,我根据平时教学积累的材料,写了一篇长达三四万字的教学总结《事实给我敲了警钟》,教导主任和主管教学的副校长都很赞赏,推荐给济南市语文教研室。

为了切实了解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我还曾经和学生实行“三同”,一同参加集体活动,一同在食堂吃饭,一同在集体宿舍住宿,坚持了一个学期。

我的积极表现赢得了学校领导的好评。虽然限于我的政治身份,我不能够担任班主任,但每次下乡劳动,校领导都宣布我为“写作指导”或“秘书”。每当学校参加全市汇演,校领导总让我参与编写节目,甚至全校性的先进事迹报告稿也让我参与起草和修改。在生活待遇上对我也有所照顾,虽然在涨工资时我没份儿,但校领导曾不止一次让工会

发给我生活补助。更让我受宠若惊的是,1964年冬天,毛主席和毛远新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公开传达下来了,学校党支部为学习贯彻这个文件召开了一次扩大支委会,竟让我在会上汇报如何在语文教学中既配合政治活动又切实提高了教学效果。

不过,政策的界限是无情的。就在我列席了党支部的会议后,学校的人事干事把我叫到办公室,板着脸警告我:“新年就要到了,接着就是春节,你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新年、春节期间不要随便串门,更不能随便到外地去。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寒假里开展“四清”运动,我又理所当然地成为清查重点对象之一。在这种时候,难免出现懊丧情绪。于是就“带着问题学毛著”,警告自己:不利于改造的念头一定要消灭在萌芽状态!那时最愿意反复体会的是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题记中的几句话:“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有一次我读到一则朝鲜族民间故事,说的是一位外表严厉、内心慈祥的母亲如何教育浪子成了栋梁之才,读后浮想联翩,感动得彻夜不眠。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过去,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赵孟頫一直有看法。所以,尽管魏启后先生说“赵孟頫也不是不可以学”,但一直没有引起我的重视。也买了一些赵孟頫的字帖,但一直放在书橱里,几乎没翻过。

我对米芾情有独钟。至于苏东坡说他的书法特点是“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实事求是地说,我至今没有领悟。不过,我喜欢米书自有自己的理由,那就是我觉得米书独特,特别是他那个自称是“臣刷字”的“刷”,起初很神秘,琢磨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悟出来,后来还是魏启后先生的一句“我这就是刷字”的话,这才让我茅塞顿开,豁然领悟。于是以后再读他的帖,就很注意他“刷字”的“刷”法以及“刷”后产生的独特效果。

我很迷,甚至把他的字挂在墙上,早也看,晚也看,常常一看半天。

米芾的字耐看,你看一遍还想看第二遍,看了第二遍还想看第三遍……你看不透,也看不够!比如某个字,你自以为掌握了,可你看另一本字帖,同是这个字,他又变了,变成另外一种写法了。鉴于此,我买了一本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米芾行草书集字帖》。一开始先是粗粗地翻了一遍,所得不多,就放下了。

去年赴美三个月,回来我又读这本《米芾行草书集字帖》,渐渐地读下去了,越读越开窍。我古诗文功底差,写字的功夫又不行,看这本字帖,既学了古诗,又学了米字,你看这多好!

往往受益不自觉。忽一日我写了一幅字,写完我惊讶了,我发现我明显地比过去写得好了。这让我很受鼓舞。

于是,我就把一本放大的《蜀素帖》挂在了墙上,开始临写起来。哎呀,我临得太差了,可以说跟《蜀素帖》没有关系。尽管我知道一开始临得不像不要紧,但我仍然知难而退,停下来了。记不

【书法漫谈】

临帖与读帖

□常跃强

得是谁说的,那话的意思是——学米字不能学早了,学早了就跟寡妇出轨一样,想改也改不过来了。我觉得这话也对也不对,说对呢,那就是告诫一些人学米别学个皮毛,只会把竖折钩变成光折不钩,像《方圆庵记》中老是重复出现的那样的笔画,这不好。说不对呢,那就是你学早了也学不了呀,你若是能跟白蕉那样,学欧学虞到写一个字能跟字帖上的欧字重叠,那很了不起了。就是当这样的“书奴”又有何妨?恐怕这样的“书奴”也没人能当得了。米芾也不是一开始就是米芾的,他下的功夫太大了,以至于学谁像谁,王献之的《中秋帖》说是他临的,连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鹤群帖》也有人说是他临的,哎呀,这就太神了。王铎写得够好的了,看了他的《吴江舟中诗》,惊呼:仙哉!

他学“二王”,即使学得再像,他也成不了“三王”。这一点他清楚。同时,当他意识到自己学这个学那个还没有自成一家的时候,于是开始变形——金蝉脱壳,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面目。这样,米芾就真的成了米芾了。

经过一番思考,我终于明白了我临《蜀素帖》失败的原因了。说到底,还是自己的功力太浅。我寻思,我这个时候,临临《方圆庵记》还差不多。

我今年六十有二,断断续续地学书法已有四年,没学出啥名堂,我知道自己学晚了。但是练书法可以健身养性,这也很好呀,于是我就坚持继续学着写。有一次,我从一家书店里买了一本《林散之讲读书法》,拿回家就迫不及待地读,一边读一边对照着检查自己,想从中找到一条出路。忽然我眼前一亮,看到了一句话:先赵(孟頫),再米(米芾),上溯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也是一条路。

这句话很对我的心思,于是我就又开始学赵。最先临的是《胆巴碑》,很顺手,又临《妙严寺记》《三门记》,皆顺手,这让我高兴极了,并认识到了自己过去的井中之蛙的偏见。赵孟頫不简单,你看他的行书《洛神赋》,谁能比得了?我买了一本故宫藏本《洛神赋》字帖,后面有王铎的跋。王铎大赞之:“此卷审观数日,鸾飞蛟舞,得二王神机者,文敏一人耳。”现在,我临赵孟頫的《仇锬墓志铭》,《仇锬墓志铭》是赵晚年的力作,很老辣。在我临写的过程中,我发现赵孟頫也学米,也刷字,只是不太明显罢了。看了一条资料,说起孟頫不但学米,还收藏米的书法,继承米的崇古思想呢。

当代,林散之是大家。有人说郭沫若生前曾称他为“江南第一笔”。现在我不盼别的,但愿沿着他指的这条路能有点造诣。

(本文作者为知名作家)

【读史札记】

□施京吾

袁世凯在清朝覆灭、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却敢于逆世界潮流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试图整合人心,重建帝制。不能不说袁世凯具有高强的政治手段,具有改造中国政治的巨大魄力——这并不是对袁世凯的讽刺,而是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一书中所揭集的历史。

但是,这更不是对袁世凯的赞美,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逆之则亡。袁世凯固然雄心不已,颇有扭转乾坤、重振国威之宏愿,然而,在重大历史关头面前,却没有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没有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方向,这既是一种必然,而在历史的变化过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做好了思想、精神的准备,包括袁世凯这样的一代枭雄。

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袁世凯并非如过去教材中描绘的那样一无是处。当革命党人打响

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之后,拥有强大的北洋军队的袁世凯没有采取对抗措施,从而使民国政府在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宣告成立。同时,袁世凯还顺应形势,在他的劝告下,清王室以逊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统治,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和平转型。或许,这其中包含了袁世凯巨大的野心,但民国政府毕竟是公民性质的政府,袁世凯与民国对立,倒不如直接继承清王朝的统治,这两者之间的轻重和利益得失,他是能分得清的。

清王朝所代表的中国传统集权体制早已穷途末路,清政府对制度转型问题长期裹足不前,所造成的后患十分严重。旧制度已名存实亡,民国政府面对的是军阀当道、外忧内患,几乎难以为继的局面,欲重整山河,中国或许需要一个政治强人对国内局势进行统领,孙中山之所以主动让位于袁世凯正是出自这样的目的,也体现了孙中山内心世界的宽广与博大。当时,袁世凯不论政治实力还是军事实力在国内毕竟独占鳌头、最为强大。但袁世凯的强

大也仅仅是与国内各派别政治力量对比,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仍然显得不堪一击,这种力量的薄弱,现在看来显然不能归咎于袁世凯的无能,乃是满清政府最后几十年留给那个时代的最后遗产。

列强在中国的巨大利益诉求、国内政治力量的交织,人民生活的极端贫困,耻辱的“二十一条”,更将袁世凯政权推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上。以当时中日力量对比,完全拒绝“二十一条”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完全接受也是国人绝对不能接受的,袁世凯通过一定外交手腕使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在列强的干预下,袁世凯政权只接受了“二十一条”的部分条款。正是“二十一条”,彻底暴露了袁世凯作为一个旧时代老官僚的所有习气:狡猾、自私、短见、保守、顽固以及对权力的强烈欲望。尽管他亲自劝说清王室逊位,却没有从中认识到这是中国传统体制的终结,反而认为中国社会当下的混乱、孱弱是因为专制还不够,根本不认识到公民社会是人类社会

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之路,再加上混账儿子的怂恿、居心不良的文人鼓噪、自以为是的西方学者的帮闲,袁世凯不仅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命运和生命,也使公民政治在中国遭受到巨大的打击,袁氏的洪宪王朝成为中国近代史之笑料。

任何一个国家、社会和个人可能会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在需要做出重大抉择的时候,往往才能真实地体现一个人的品德、智慧和才干。袁世凯在当时如果对形势有着正确的分析,完全可以咬咬牙,沿着共和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中国或许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然而,孙中山的让位没有使自己成为中国的华盛顿,而袁世凯重回帝制更没有使自己成为中国的拿破仑,但孙中山对共和体制的执着追求却使他流芳千古,而袁世凯的结果则是身败名裂。

向前走还是向后转,仅仅在一步之间,写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历史。以史为鉴,或许能从《袁氏当国》这一历史事件中得到一些启示,找到某种答案。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